内部发行，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研讨实录

第 48 期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868号办公A楼2201室
邮编：200023
电话：86-21-62188752
传真：86-21-62188714
网址：www.sdrf.org.cn

Address：Rm.2201, Office Building A, 868 Longhua East Road, Shanghai, China
ZipCode：200023
Tel：86-21-62188752
Fax：86-21-62188714
WebSite：www.sdrf.org.cn

SDRF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编
二〇一四年二月

序　言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于 1993 年成立，以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事业为宗旨；以募集、运作资金，研究、交流、资助、奖励有关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项目为业务范围。

2005 年以来，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业务开展方面进行了更多有益探索，推出了每月的“上海发展沙龙”主题活动，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合作，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和实业界人士进行演讲，与听众进行交流。时至今日，沙龙已经活动了 80 多次，成为了基金会的一个品牌。

从 2007 年开始，基金会在每年的年中与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合作举办“世界和中国经济论坛”，重点分析全球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在每年的年末与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合作举办“中国经济论坛”，着重分析当年的经济形势，展望来年的经济走势，至今均已经举办了六届。

2009 年和 2010 年，基金会又分别召开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海内外著名学者、经济学家、投资者、金融和

商界人士，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基金会从 2009 年开始至今，与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合作，连续五年合办“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专题圆桌讨论会，针对城市化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基金会也将知名专家和基金会自身的部分研究成果编撰成书，“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丛书”迄今已出版了三本，分别是：《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新型城市化：抉择和路径》。

我们希望能够将有价值的见解与朋友们分享，因此把沙龙和研讨会的一些精彩内容陆续编辑成册，称为“研讨实录”，不定期的发行，旨在将这些活动的互动过程尽量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给我们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以使基金会能够更上层楼！

是为序。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会会长

编者的话

本期《研讨实录》收录了基金会最近两次学术研讨活动的记录，分别为第 88 期发展沙龙乔依德关于央行金融 30 条与上海自贸区及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演讲，第 89 期发展沙龙汪玉凯先生关于中国改革发展新阶段与公共治理变革的演讲。

我本人的演讲题目是“从央行金融 30 条，展望自贸区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推动”，主要论述了金融 30 条的结构、性质和特点，并从资金流向的角度分析 30 条的主要内容和亮点，强调落实金融 30 条是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大机遇。我的看法是：上海自贸区金融方面试验的性质是以在岸金融为导向的带有离岸金融因素的金融开放先行 / 待行区。自贸区在金融方面的先行先试是可行的，至少在不涉及资金内外定价方面，是自贸区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自贸区改变或丰富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原有格局和途径，将成为连接境外离岸金融中心与在岸金融中心的桥梁。自贸区金融开放将成为推动资本项目逐步开放的有益试验和实质性的落实。

国家行政学院的汪玉凯教授的演讲题目是“中国改革发展新阶段与公共治理变革”。汪玉凯先生主要谈了三个观

点。第一，改革发展新阶段对公共治理带来新挑战。新阶段的标志是：改革开放的整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传统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有增无减。第二，公共治理变革重要性凸显。公共治理变革的路径可以是：优化公共治理的体系和结构；突出政府改革；提高公共治理能力；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步伐。第三，排除改革的阻力，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智慧。从政府来看，行政改革解决的是政企分开、转变职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从政治体制来看，宪法的权威、政党的作用、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这四个是整个公共治理体系结构的上层部分，更具有决定意义。要上下联动，不能只在行政层面做文章。在未来的公共治理变革中，最大的阻力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既得利益，二是政府自身。

更为详细的精彩内容，请大家阅读本期《研讨实录》。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二日

目 录

乔依德 从央行金融 30 条，
展望自贸区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推动.....1
提问与讨论.....24

汪玉凯 中国改革发展新阶段与公共治理变革.....33
提问与讨论.....59

从央行金融 30 条，展望自贸区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推动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上海新锦江大酒店　2013 年 12 月 19 日

王荣华：各位专家，今晚是本年度沙龙讲座的最后一期，这期由乔依德同志来演讲。他今天不是以秘书长的身份，而是以专家的身份演讲，题目是“从央行金融 30 条，展望自贸区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推动”。三个主题词——央行金融 30 条、自贸区、上海金融中心建设，都是非常重要的。按照惯例，我也介绍一下演讲人的情况，其实大家对乔依德都很熟，但我还是要说两句。乔依德同志也算是我的校友，因为他和我都在社科院呆过。他曾在社科院世经所从事研究工作，担任过所长助理。他 1985 年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公共管理专业，获得硕士学位。以后在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工作。十年以后，由纽约人寿派往中国，担任首席代表兼总经理。他有研究，有实践，还做过管理。乔依德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理论、国际金融以及宏观经济形势。过去的沙龙讲座，都是伊德主持的，他的风采大家都领略了。我觉得他给我的印象有三个特点，一是不尚空谈，能够紧密联系实际；二是抓住焦点和热点，重视前瞻和前沿的分析和解读，非常敏锐和专业；三是他的意见既不走中庸，也比较不走极端，是综合各方面的，至少我觉得是比较有说服力的。这完全是个人感受，反正他的风

格大家有目共睹。今天的演讲，乔依德是有比较充分准备的，他有扎实的专业背景，他组织并参与了相关课题的深度研究，而且有成果，也得到有关方面的好评。所以我废话少说，下面我们掌声欢迎乔依德，我们也期待共享他的睿智，有请乔依德。

乔依德：非常感谢王院长的介绍，讲得我有点不好意思。首先我简单说明一下，因为平时都是我组织，为什么这次我来讲？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我们也联系了四五个人，但他们年底都很忙来不了。第二，我们上个月没有办沙龙，因为纪念基金会成立 20 周年开了一个会，后来又搞了一个中国经济论坛，我想这个月再不搞也不太好。第三，我们刚好对自贸区也做了一些思考。上周末中金公司在杭州开会，也叫我过去讲一下自贸区。下星期，海南社科联也让我讲一下。我想既然人家请我，我们这里也可以讲一下吧。搞了 80 几期，我第一次讲一下，也不算太过分吧，反正在座都是新老朋友，讲得不对，大家包涵。当然我自己还是做了努力，希望能至少提供一些新的想法、新的思路、新的说法，不至浪费大家的时间。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从央行的金融 30 条来看自贸区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推动”。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上海自贸区和全世界所有的自贸区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上海自贸区包含了金融方面的内容。其它自贸区是通过关税减免等措施来促进贸易，一般来说，不包含金融的内容。但是，我们的自贸区包含了金融方面的内容，这是上海自贸区的难点，也是一个有争议的地方。根据我自己私下和公开的接触，有一些经济学者，也有其他方面的人士，对此抱有怀疑的态度。12 月初，我在香港参加一个研讨会，讨论的题目

是亚洲区内贸易和人民币的效应。我来自上海，主持人就问我上海自贸区的情况，我简单介绍了一下。轮到哈继铭时，他很直截了当地说，怎么可能在一个很小的区域里面对金融进行改革或者开放，因为资金是流动的，你怎么能管得住？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我想如果仔细看金融 30 条，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一个客观的判断。下面说一下我演讲的提纲：第一，金融 30 条的结构、性质和特点；第二，从资金流向角度，分析 30 条主要的内容和亮点；第三，金融 30 条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大机遇；最后，把一些问题总括地讲一讲。

一、金融 30 条的结构、性质和特点

金融 30 条分布在七个部分。主要内容是第二（分账管理的帐户体系）、第三（投融资、汇兑便利）、第四（人民币跨境使用）、第五（利率市场化）、第六（外汇管理体系），这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总体原则，第七部分是监管，不能说不重要，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相对而言，中间的五个部分是主要内容。30 条的各项条款之间是互有联系、有所制约的。比如第 15 条“区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从境外借用人民币资金”，有人说这个挺好，但是他忘记了第 5 条的第三句话是“居民自由贸易账户与境内区外的银行结算账户之间产生的资金流动视同跨境业务管理”，其实是有制约的。我想这点对理解 30 条是很重要的。其中的部分条款，银监会、证监会的有关文件已经有所涉及，30 条就是把它们集中在一起，比如跨境投资，在证监会和银监会的文件里都有。另外，30 条与自贸区总体规划的原则和精神是相一致的，这个也很重要，不能光看 30 条，还是要和总体规划一

起看。最后，30 条是一个指导性文件，实际操作还需要有细则。

上海自贸区金融的实质到底是什么？是离岸金融还是在岸金融？央行上海总部负责人张新说“人民银行在试验区内组织开始的金融业务都是在岸业务，离岸金融不是试验区金融支持措施的目标，离岸金融中心也不是试验区建设的选项。”但是前两天报纸上报道，上海保监局局长裴光说，要“将上海自贸试验区保险市场定位为离岸保险市场试验区”。所以还是有不同的说法，这个我最后也会讲一下。另外，30 条有几个特点：国际一线是放开的，以后境内和境外的资金流通是比较畅通的，限制比较少，但二线是管住的。30 条总的倾向是鼓励资金向外流动，允许资金从区内向区外境内有限渗透，一个是管住，一个是有限渗透，这是辩证的统一。它也倾向于支持实体经济，在条款里，包括总体规划里，对于金融租赁公司是非常支持的，金融租赁公司的业务是什么呢？它不但是融资，还是融物，买大型设备租给别人，这对解决我们的产能过剩有好处。

前面是一个大略的素描，下面我想讲一下，30 条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我从资金的流向角度来分析 30 条的主要内容和亮点。

二、从资金流向角度，分析 30 条主要的内容和亮点

从图 1 来看。圆圈相当于国境线是一线。圆圈里面，直线是区线，即二线。直线的左边就是区内；直线的右边就是境内区外。从这里就可以看到 30 条的资金流向。第五条当中有一句，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居民自由贸易账户与境内区外的银行结算账户之间产生的资金流动视同跨境业务管

理”。居民的帐户和境外的帐户，是可以互通的，当然所有的帐户，在区里面都是可以互通的。一部分帐户和境外可以互通，另外一部分帐户可以跟区外境内的非居民帐户互通，这是一个有限的开放。在同一个非金融机构里，可以有一个互通，但它是有限制的。另外居民和非居民帐户，都可以办理跨境业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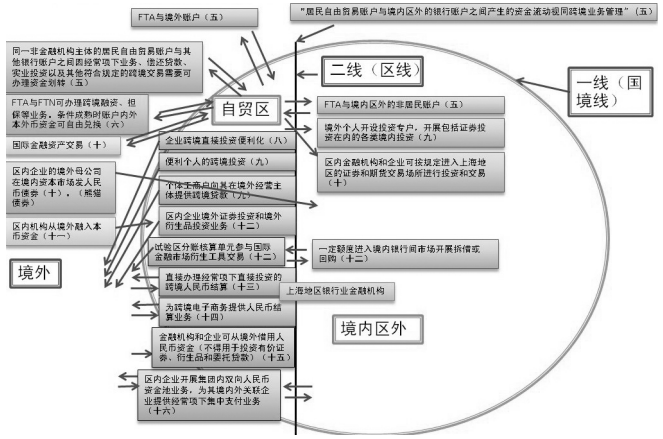

图 1：从资金流向角度分析 30 条的主要内容和亮点

下面我想把它归类（图 2）。

首先，是第二部分的分帐户管理体系，就是我前面讲的，这是我们自贸区创新的特点。

其次，是跨境投资。第 8 条、第 9，第 12 条，都讲到企业跨境投资便利化，以及个人跨境投资，而且可以对外投资，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衍生品投资，这些都可以。

再次，是跨境融资，有 6、10、11、15 条。其中的第 11 和 15 条，我觉得央行写的人脑子是很灵活的，从境外把人民币借过来，既放在第二部分的汇兑便利，又放在第三部分的

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内容是一样，放到两个条款里面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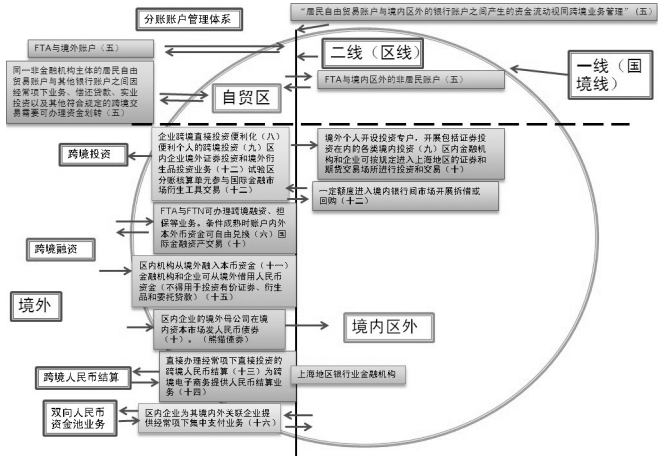

图 2：从资金流向角度分析 30 条的主要内容和亮点（分类版）

然后，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区内企业的境外母公司，可以在境内资本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这一条有很大的突破，因为过去只有际金融公司 IFC 和亚洲开发银行在国内发人民币债。

另外，跨境人民币结算，境内境外都可以通。

最后一点，是人民币双向业务。一个公司可以在区里设立资金池，人民币资金既可以境内境外通，也可以区内区外通。根据报道，已经有七家企业，包括宝钢，已经在区内建立了人民币资金池。境外人士在区里面，可以来投资我们境内的证券，这个就突破了 QFII。过去，QFII 一定要通过机构而且有一定额度，现在只要你是在区内的外籍人士，不用通过 QFII，就直接可以投资，这也是很重要的。此外，还

可以一定的额度，在区内银行中市场开展拆借和回购。一定额度是多少呢？要看细则。我们国内企业有这个需要，需要通过海外融资，融到自贸区，因为海外融资成本比国内低。我也询问了有关人士，自贸区有多少额度可以用到境内来？回答是，第一，要等细则；第二，不会全部放开，也不会一点不放开，如果一点不放开，自贸区没有意义，所以会放开一部分。总的原则就是这样，所以我想，要等细则出来。

金融 30 条的亮点我再总结一下。

首先是分帐管理体系，它是借鉴了外国的经验。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日本、泰国和中国台湾在建立离岸金融市场时，都搞了分账的账户管理体系。美国叫 IBF，因为 80 年代初美国对利率有管制，很多美元跑到欧洲去，美国就搞了离岸金融帐户。但是，国外那些离岸金融和我们的自贸区帐户有个不一样，它没有地域限制，在同一个银行里允许非居民开帐户，它有个隔火墙，但没有地域限制，这与我们不一样。我们借鉴了国外的经验，但是带有自己的特点，就是对于区内区外，虽是分离的但还是有一个渗透，包括居民和非居民，而在美国、日本、泰国、中国台湾基本是隔离的。当然，它们也可以有渗透，如何管理这个渗透呢？有各种办法，比如征税等等，有可能我们以后也会采纳这种办法。

其次，就是跨境的投融资便利，突破了 QDII。

再次，允许境外人民币借款，就是前面我讲的熊猫债券。这个熊猫债券和香港发的点心债、台湾发的宝岛债是不一样的，这两个债券是使已经在境外的人民币通过发债回流到国内来。而熊猫债，是使国内的人民币通过发债流出去，实际上这对于我们人民币走出去有更大的意义。

最后，就是对区内企业的资金划拨，是很大的便利。

这四个亮点，还是有很大吸引力的，所以很多企业现在愿意到自贸区去。

三、落实金融 30 条是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大机遇

落实金融 30 条是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一个重大机遇，就是我总的题目。说到推动作用，尽管我们官方文件说自贸区的发展和四个中心建设要联动机制，但是我觉得从目前来说，恐怕还是自贸区对四个中心建设推动作用更明显。从当前的角度来说，还是要看自贸区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带来哪些机遇。

目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现状，我觉得是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特别是国务院关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九号文件出来以后，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的突破，特别是外资的法人银行，差不多全国的 40% 都集中到上海，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要看到与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要求，与其它金融中心或者国际大都市相比，与香港，新加坡，纽约相比，我们的差距还是很大。而且与我们小平同志的期望相比，也是差距很大的。大家都知道，1991 年春天的时候，小平同志是这样讲的，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要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老实说，小平同志这个话，我们执行得还是有差距的。坦率的说，各个部门是不是非常真心地来做这件事，我是有怀疑的，根据我的观察，这方面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最主要的原因，我觉得是宏观经济的条件欠缺，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上还没有完全开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前提条件，任何国际金融中心都要求货币要可以自由进出、自由兑换，这个做不到是很大的问题。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的金融改革都没有完成，这是主要的。

另外，我觉得金融监管权过分集中于中央部门，也是一个问题，这次三中全会决定中，有这样一句话“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以前不是很明确，现在要界定。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如果国家把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来建设，对于上海这样一个地方，恐怕还要有一些特殊的考虑。我并不是说一定要上海市政府有一些监管的职能，我的意思是说，“一行三会”本身的权力应该更多的下放。比如说，央行也建立了上海总部，上海总部以前的副行长退休了，但是现在就没有新的副行长上来，组织机构是很重要的，谁当头也很重要。再比如说，央行大区的分布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美联储的，但是美联储纽约分行的头是美联储货币委员会的委员。如果重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由于上海市场已经那么大了，上海总部的负责人应该是央行副行长，应该理所当然的是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如果看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应该要下决心做这个事情。还有体制上的其它缺陷，比如任何国际金融中心都有一个全国性的媒体，上海要建立国际金融中心，是不是应该要有特别的考虑？中央电视台用不着都集中在北京吧？可以分广州，上海几个地方，都在广电总局下来管理，但是各有各的特点。上海要有全国性的媒体，包括纸质媒体。纽约的华尔街日报、伦敦的金融时报等等都是享誉全球的，上海这方面缺陷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应该进一步加强。

下面我想讲一讲，自贸区的金融开放、先行先试，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国际金融中心的基

本要素是什么？根据我的理解，从广义角度，应该至少包含下面四个基本要素：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比较严格严明的法律制度、良好的商业环境、优秀的金融人才。这几个方面对于国际金融中心是必不可少的。

讲到金融人才，对于一些流行的说法，我有不同的看法。我常常看到，报纸上有这样的文章，说我们上海金融人才很缺乏，比如说纽约的金融人才占了人口的百分之多少，而我们的专业人员比例很低。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这种比较我觉得不太靠谱，往往把整个上海市的人口算进去，而纽约伦敦都是一个城市，它的郊区不算在城市人口里。第二，更重要是，我们现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欠缺，不是因为人才不够造成的。我跟很多管理基金的经理谈过，他们说，很大问题的是报批一个新产品，要花很长时间，好几个月，甚至一年，才能批下来。有一句话叫“栽了梧桐树，引来金凤凰”，现在我们出国留学有那么多人，回来不一定能找到很好的工作。我觉得这种文章，有点误导领导了。好像我们搞培训，搞一点钱，培养了很多人，但业务不能开展，有什么用？没有用的。我不是说金融人才不重要，但关键是现在真正可以做的业务不够。当然，我们自贸区现在先行先试，可能带来更大的业务，这样的话，金融人才会进去的。而且金融人才的培养，不单单是在学校里上几门课，更重要的是通过实践长才干，真正的人才才能出来。华尔街很多人根本不是搞金融的，搞数学、物理、计算机的也可以进入这个领域。这一点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从较狭义的角度来说，国际金融中心包括四个要素：高效便捷的国际投融资服务、本外币境内外自由流通、金融体系较为全面完善、国内外金融机构和交易场所较为集中。

很重要的是要有高效便捷的投融资服务，本外币、境内外要自由流通，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金融体系要比较全面完善，国内外金融机构和交易场所要比较集中，这一点对上海来说，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前两年的陆家嘴论坛上，做过我们证监会的顾问的香港人士史美伦说，上海要成立国际金融中心，大的国有商业银行应该迁一两家来。2011 年在南京的一个会上，我和戴相龙坐在一起，我们私下也聊，他当时也很担心：2020 年上海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目前离这个目标差距还很远。他也觉得，大的国有商业银行要迁到上海来，当然他是私下说的。我觉得就是如果做不到总部搬过来，也要努力使第二总部搬过来。中国银行的全球人民币业务总部搬过来了，以后还是需要有一定的金融机构的积聚，这是很重要的。

自贸区的金融开放先行先试，将会促进这些狭义的基本要素的扩展或形成，通过什么效应来做到这一点呢？我觉得有三个效应。第一，是外溢效应。区内有很多资金，有很多渠道，可以有限渗透到境内。特别是对上海来说，有很多业务不仅仅区内的银行可以做，在上海地区都可以进行人民币结算，这也是一个外溢效应，会带来更多的业务。第二，是示范效应，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上星期，中国金融租赁协会在黄浦区开会员大会，叫我讲讲自贸区的情况。因为在黄浦区开，请了周伟书记来，他也是我们的理事。大家有点尴尬，我们在讲自贸区有什么好处，他那边想吸引金融机构落户在黄浦区。自贸区管委会也有一个人在那里，他介绍在自贸区注册，四天就可以搞下来。后来，周伟说，到我这里来一天半就搞定。这个示范效应出来以后，也刺激其它区县，有些事情是可以做的，特别是注册等方面，我想

这是一个示范效应。

最后一个效应，讲的人比较少，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大家看看能不能站得住，叫延续效应。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自贸区，我们有很多金融的基础设施，包括黄金交易所要成立自贸区分所，以及最近要成立的国际期货交易所、能源期货交易所，这些机构就算以后二线也放开了，它还在那里。这些机构会成为我们金融中心的有机部分，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另外，由于自贸区以后的境外境内资金流动，形成了金融的渠道，它的外部性可能是具有一定惰性的，资金怎么运作，怎么操作，做了以后，有一个习惯，下次还是通过你来做。在这一点上，自贸区对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有一个持续的效应，以后会成为金融中心一个重要的支撑。

现在我们讲了很多，包括领导也一直说，自贸区的实验要可推广可复制。我在想，是不是什么东西都是可以推广可复制的？我认为有些是不能的。我们也要关注一些不可复制、或者很难复制的因素。举个例子，上海的地理位置是不可复制的。上海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大都市，这就是因为它在中国海岸线当中，在长江口，这个位置是不能复制的。最近在闲聊时，有人提出应该恢复华东局华南局。我觉得有道理。上面有一个局比较好协调，否则下面协调来协调去，很难弄。包括京津冀，开了多少次会都搞不下来。上面有一个组织框架，便于协调。我想这些也要考虑。还有就是上海的商业环境，上海人做生意比较讲诚信，比较守纪律，这些恐怕也是比较难复制的，我不是说别人不守信，但这是上海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最近我在看朱镕基在上海讲话实录，他当中也讲过，上海人一般做事比较守规矩，这个是很难复制的另外一个比较难复制的是我们的人才，当然人才

是可以流动的，但人才它为什么要在上海？原因很多，上海的居住条件，文化氛围等等，这也是比较难复制的。为什么我强调这些因素？我不是反对金融创新要可推广可复制。我的意思是，如果要建立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它总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如果什么都可以复制，那为什么要在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这一点，我想我们应该要想到。这些因素，跟上面讲的一些基本要素，就构成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特别的地方，也是任何一个国家或者经济体只有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原因。很多人说美国有很多金融中心，其实只有纽约是国际金融中心。芝加哥不是，波士顿也不是，他们只是在某一方面较突出，芝加哥期货做得好，波士顿资产管理可以，但都不是国际金融中心。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国际金融中心，除了一些基本要素以外，有一些特别的东西。我们在搞自贸区的时候，为了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对于不可复制或者很难复制的东西，我们同样要给予一些关注。否则老是说可推广可复制，那怎么来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四、总结

最后是我的一些结束语，对于前面讲的，做一些总结。

第一，就是前面我讲到的，自贸区金融方面的实验，它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是离岸金融还是在岸金融？我自己给出的定位是，它实际上是一个混血儿，带有离岸因素，以在岸金融为导向的。可能希望这个地方以后能发展成在岸金融，但是离岸金融是一个不能抹煞的因素，否则为什么建立那么多独立帐户？上海黄金交易所最近也宣布可能要在自贸区建立一个分所，专门做境外的。就算以后二线打通的

话，还是可以继续做。像美国虽然后来什么都开放了，但是 IBF 还在，只不过量下降了，它的历史作用完了，但是这个机构还在。所以我给它的定义，就是上海自贸区是以在岸金融为导向的、带有离岸性质因素的金融开放先行待行区。大家开车的人知道，待行区是上海的发明，左转弯的车，前面绿灯走了，可以稍微开 20 ～ 30 米，等在那里，等正面没有车，才可以打弯。我想对于我们自贸区，也有这部分内容，就是说，对于二线的开放，还不是完全可以走，还要等上面的开放，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完全否定离岸因素不现实，但说这个就是离岸金融也不是我们的目的。因为和其它离岸中心有一个不同，我们还是可以有限渗透，从区内到境内区外，这有一点像杂交，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第二，我想回答一下，在那么一个有限的范围里面，金融方面可以不可以先行先试？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我也知道，有些人为什么会提出对这个怀疑，他们的怀疑有没有道理？我也认为也有一定道理。我仔细琢磨了一下，我觉得是这样的，第五部分是利率市场化，第六部分是汇兑机制的改革，但是这两部分的内容都很少。利率市场化只有几条，只不过说上海机构可以作为人民币利率市场化优先考虑的机构。而且我还要指出，我们平时讲的是汇率形成机制，这里没有用这个词，用的是汇兑管理，这是比较窄的。再仔细看一下我们总体规划，没有提到金融改革，我非常仔细地看，它强调的是金融开放创新。所以我前面讲的，第三、第四部分是开放，这一点是我自己的体会。所以整个来说，金融 30 条，它的方向是开放，不是改革。或者说，利率市场化不是它的重点，重点是开放创新。仔细看一下，在总体规划中没有讲到存款利率可以放开。它说是资产方的定价可以市

场化。资产方是什么？就是借款。银行的存款，是负债方，所以总体规划中，用了资产方可以进行定价市场化。利率是什么？利率是国内资金需求和供给的反映，以及它的调节机制。汇率是什么？是跨境资金需求和供给的反映，或者调节机制。所以，利率和汇率改革在 28 平方公里内确实没有什么意义，确实会产生很大的扭曲，而且我们利率市场化已经启动了，为什么还要在自贸区里面做呢？没有这个必要。利率市场化路径已经非常清晰了，没有必要在这里试。所以有很多文章说，这表现了央行的谨慎，谨慎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没有这个必要。这是我的理解。

另一方面，我觉得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开放，改变或者丰富了人民币国际化原有的格局和途径。自贸区将成为连接境外金融中心和在岸金融中心的桥梁。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很清楚，我们在香港、新加坡、伦敦、台湾搞离岸金融中心，后面怎么样呢？当然以后资本帐户开放，上海可能成为全球人民币中心，但这之间怎么衔接？不是很清楚。我也请教过一些有关人士，一方面说上海要建国际金融中心，一方面又要建立香港离岸金融中心，这两个最后怎么衔接？我得不到一个非常清晰的回答。反正他们说，资本帐户开放了，资金肯定到上海来，这就不是很清楚。现在上海自贸区搞了金融以后，这个路径就比较清晰了：自贸区的金融可以成为离岸金融和在岸金融的桥头堡，或者叫桥梁也好，它资金流通就比较活。如果 30 条开始执行，资金的流向和流量会怎么样呢？我猜想，一开始比较多的资金会流向自贸区，资金肯定要从境外过来，比如从香港过来，因为我们国内的利率比较高。据马骏估计，可能有 1000 亿人民币过来，因为现在香港有接近 8000 亿存款。另外，我们境内区外的资

金，可能也会到自贸区去，比如要建很多机构，现在据说成立两千多家，假定成立 5000 家，每家如果有 1000 万，那就是 500 亿，且不说还有很多通过跨境到外面投资的，这里也要过一过。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可能有比较多的资金，可能 2000 多亿资金会进来。如果它的利率和境外比较接近就比较稳定，这样资金可能流进流出，包括流到区内区外，可能有一个动态的循环，这是我的一个猜测。这样就比较好，能够达到我们建立自贸区金融方面的一个目的。

最后一个就是自贸区的金融开放了，这将成为推动资本项目逐步开放有益的实验和实质性的落实。因为大家可能知道，对于资本帐户开放，国内经济学家有很多争议，如果以光谱来比喻的话，最边上的，可能是林毅夫的观点，他不赞成资本帐户开放，甚至他去年说，资本帐户开放是自毁长城。假设我把他放在左边，这个左没有意识形态的意思，靠里面一点的可能是余永定老师。他认为资本帐户还是要开放的，但是他认为，现在要谨慎，谨慎的原因在于按照国际上的经验，国内改革和开放有一个次序问题，应该先完成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然后再开放资本项目，他是这样一个观点。最右边的经济学家，特别是人民银行调统司司长盛松成，我们也请他来演讲过，他认为应该加快。几个月以前，他也写了一篇文章，回应那些认为现在形势不明朗的观点，他认为短期资金波动不影响长期推进，还是应该继续加快。我个人比较同意余永定老师，但是我可能比他更激进一点，更靠右一点。原因是什么？所谓次序问题，我觉得不能很教条地看，因为我们三个部分，就是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和资本帐户项目开发，我们都是渐进式的，每一小步之间的次序不是那么重要。举个例子，我们去年贷款利率放

开了，汇率波动幅度放开一点了，谁先谁后没什么关系。有关系的是最后一步，，资本帐户要允许资金流出流进，没有任何限制，这一步很有关系，要放到最后，要等国内的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差不多完成以后，这个闸门才能开。我觉得这一点要这样考虑。

盛松成讲短期资本波动不影响加快推进，这里有什么问题呢？现在 QE 要退出，不能把 QE 退出看成一般意义上的资本波动，这是大的事情。因为美联储资本负债表原来的规模只有 1 万亿，现在有 3 万多亿，今年 5 月份一宣布要退出，全球都引起很大的波动。这不是资金的小波动，是非常大的事情，而且这个事情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对待它。今年 9 月份，我在交大的一个论坛上，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人长跑，长期来说，对身体很健康很有好处。但如果今天刮大风，或者雾霾天气很严重，是不是可以停一天、两天，看看外面情况再跑？这个影响你的长期健康吗？我觉得不影响。对 QE 退出，在那么不明确的情况下，晚一年、两年，我觉得没什么不可以。我是这样一个观点。而且我再提醒大家这样一件事，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资本项目有这样一个句话，“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你怎么理解加快？同时我也提醒大家，经济工作会议决议公报上，只提到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根本没有提到资本项目开放，一个字都没有，你们去看一下。也可以说，2014 年在资本项目开发上不会有大的动作。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林毅夫老师的观点，他讲了很多，因为他在做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跑了很多国家。他知道资本帐户开放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成功的，有很多国家受不了短期资金的冲击，

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所以提了这样一个想法。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就是一般发展中国家，可以关起门来搞，但对于中国这样的第二大经济体来说，货币不走出去行不行？我觉得这里面有问题的。我们来看下面中美对外资产结构的比较（图 3）。2012 年中国的对外资产大部分是外汇储备，我们的负债都是来华的直接投资。而美国投资负债的各个项目都比较均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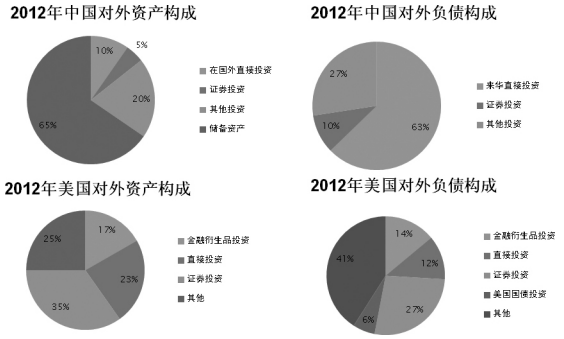

图 3：中美对外资产负债表结构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外汇管理局 2012 年国际投资头寸表和美国商务部 2012 美国国际投资头寸表

最主要的还在后面，资产和负债是由什么货币构成的？我们对外资产和负债的货币币种是一个错配（图 4）。根据世界银行 2011 年的报告，在 2009 年年底的时候，中国人民币以本币计价的负债占 76%，海外资产只有 0.3%。人民币是强势货币，长期来说是要升值的，但升值对我们的海外资产没什么好处。而美国负债是用本币，占 95%，它贬值等于是擦掉一部分负债，2007 年美元贬值 8%，一下子擦掉 4500 亿美元的负债。所以，我们对外资产的配制上、货币的错配上就看出我们人民币要走出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原因。

货币匹配：（2009年年底）	负债	资产
中国（以人民币计价的比例）	76.9%	0.3%
美国（以美元计价的比例）	95.1%	43.0%

Source: The World Bank: "Global Development Horizons 2011——Multi-polarity: The New Global Economy"

图 4：我国对外资产 / 负债货币错配的状况（与美国比较）

当然，作为货币储备国，会有很大的挑战，因为资金流进流出会很大，货币政策的执行会遇到很大挑战。但同时又是很大的收益。看看现在全世界，美国搞 QE，为什么？因为美元是储备货币，它可以搞，并不影响国内，货币流到海外去了。再看看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吵得一塌糊涂，但是他们政治精英都不是傻子，到最后一刻总能达成协议。为什么？他们知道这个利害关系太大了，如果美元被降级，美元就不能成为全球的储备货币，这对美国来说是灾难性的。我觉得要看到这一点，我们人民币跨境走出去，可以减少汇率风险，可以有助于我们企业走出去，可以对外有铸币税。这都重要，但是最关键的、战略上很重要的是，如果不走出去，可能会受制于人。

最近有一条消息，11 月 31 日，西方国家的六大央行，美联储、日本央行、瑞士央行，英国央行，加拿大央行等，他们以前有货币互换，现在把货币互换长期化，等于在发达国家形成了一个新的网络，中国被排除在外，金砖国家被排除在外，这是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财经的徐以升

写了一篇文章，他发出来以前发给很多人，也发给我，叫我提意见。他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大西洋体系，因为以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以后，形成了牙买加体系，他认为现在是大西洋体系，发达国家又开始搞起来了，是不是能成为一个体系，还要看，因为它的货币没有根本的变化。但是这样一种形势，我们要很认真地对待。人民币如果不走出去，可能会有很大的问题。

下面我还想介绍一下，最近国际经济界对这些问题的一些看法。每年 8 月份美联储都会开一个央行行长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有一位伦敦商学院的教授递交了一篇文章，她的文章讨论了到底是三重困境还是两重困境。所谓三重困境就是我们平时讲的不可能三角形（图 5），学过国际金融的人，大概都听到过这个词，就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资本的自由跨境流动，固定汇率这三项，只能选其中的两项，所以叫不可能三角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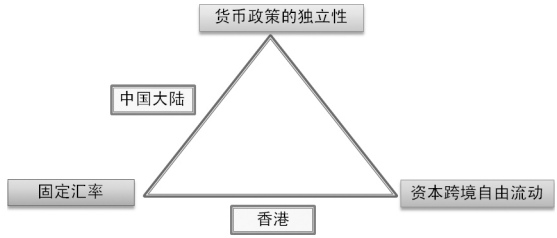

图 5：“不可能三角形”（三重困境）

很多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都有很多贡献，很多教科书都会提到这个。我下面讲到的香港，选择的是固定汇率和资本的自由跨境流动。而我们中国大陆选择的说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固定汇率，没有选择资本跨境自由流动。

这位教授的文章挑战了这样一个观点，她认为现在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以前我们讲美国发生经济危机，通过对外贸易和投资传达到其他国家，造成全球的经济危机。她现在认为不对了，现在是全球金融周期，这个金融周期的起发点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她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引起了全球各个国家的经济波动、金融波动，各个国家的货币政策都受其影响。美国开始搞 QE，引起了风暴，现在退出 QE，又引起很大的风暴，所以她认为现在不是三重困境，现在是两重困境（图 6）。

图 6：“两难”二重困境

就是有两个选择，只能选择一个：一个是只能受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摆布，他做什么，你只能被动地跟着；另外一个，是要对跨境资本进行管理，只能两选一。她这个论文出来以后，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多人现在都在研究这个事情。很多朋友也知道，我们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关注的重点是两个，一个是城市化，一个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刚才很多人拿到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那本书。明年布雷顿森林体系 70 周年的时候，我们在上海要开一个高层次、高质量的研讨会，就是要研究这个问题，包括获得诺贝尔奖的大牌经济学家、美联储的前主席，都会邀请他们来，当然不知道最后他们来不来，但我们都会邀请。这个事情我跟大家讲一下，引起大家的关注。

最后我想从我的个人经历中讲两个看法。30 年前我们

选了深圳，这次我们选了经济最发达的上海，进行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实验，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国家对于实验的成功抱有很大的信心。在《邓小平文选》中，邓小平说，我们没有首先在上海搞改革开放是犯了一个错。这对我来说，有特别的个人感受。1980 年代，我在社科院工作，有一天所领导跟我说，乔依德，找你有个事情，要你出差。是什么事呢？我们当时社科院的党委书记洪泽同志是市委委员，同时他是那时广东省省长梁灵光的入党介绍人，他身体非常不好。梁灵光说，你冬天到深圳来避寒，他就跟市委书记请假，因为他是市委委员。陈国栋书记说可以，等你回来以后，写个报告给市委。因为我那时研究港澳经济，所以叫我陪他去，做两件事情，一是领导讨论的时候，如果需要什么数据，边上能够拿出来，我所以做了功课，背了很多数据；二是回来帮他写个报告。准备的时候，邓小平刚好第一次南巡，是 1984 年 1 月，我们说要不要去啊？他们来电话说，照样去。一个星期以后，我们沿着邓小平走过的路，走一遍。回来我写报告，我印象特别深，洪泽拿了一个小本子，他说，我们市委开会，陈国栋传达了，他说我跟邓小平请示过，要给上海更多的政策，邓小平当时这样回答："这个决定是毛主席定的，这个口子我不能开。"我最后写什么东西，已经都忘记了，但我一直记住这句话。当看到《邓小平文选》当中讲到这个事情，我觉得，是这样一回事。那么 30 年后不一样了，到上海来搞自贸区，这就说明中央对于上海这样经济发达的地方先行先试，有很大的自信。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地方诉求和中央决策层的互动是非常重要的。我这两天翻朱镕基在上海的讲话实录，尽管他大部分内容都是讲上海的情况，但是当中也有一些讲到怎么和中央沟通。

比如 1988 年桑塔纳装配，中央只给上海 1 万辆的指标，上海想做 15000 辆。后来朱镕基就写了一封信给李鹏，叫陈情表，说如果三年以后桑塔纳没有达到国产化 100%，我引咎辞职，后来当然中央同意了，给了这样上海这个指标。

1984 年 8、9 月份的时候，宋平、马洪带队到上海来调查，在锦江礼堂开会，每天下午开会。当时我已是所长助理，就叫我去听，我非常高兴，大开眼界。我记得汪道涵同志，他很儒雅，但是那个会上，他讲的很尖锐，他当时就讲，广东开放当然很好，但是上海呢，中央也要有一个平衡的考虑。当时广东每年交 10 亿人民币就完了，所有多下来的盈余广东都可以自己用。10 亿是什么概念？就是上海仪表局钟表公司一年上交的利润。所以他说中央这方面要考虑，最后形成一个汇报提纲，讲了上海的定位和发展战略。后来，大概是 1985 年宣布的，也给了上海一些优惠政策。最后，1988 年财政包干，上海上交 105 亿后，其它的上海就可以自己用，后来上海就搞活了。没有这样一个东西，我想恐怕是不行的。所以上海自贸区也是这样，李克强总理来，我们领导汇报，开始做起来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地做。因为说老实话，前面也讲到，对于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上面各个部门不是很全心全意地做。我讲得不客气一点，有时候，我也看到报纸上有一些文章，讲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政治集中的体制下，怎么可以金融中心不放在政治中心呢？这明显和小平同志的指示，和历届中央的指示都是违背的。如果你是个人表达意见还可以，但其实这种研究，有的还是我们市政府出了财政的钱的。出了财政的钱，做的报告不帮上海讲话，不支持上海发展国际金融中心，我觉得这个是不行的。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们应该非

常努力地呼吁，国际金融中心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唯一的。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说不要讲什么国际金融中心，让是市场来决定吧，谁做得好，市场就决定谁是国际金融中心。听上去蛮对的，但是你仔细想一想，1949 年以前是不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已经做了选择，上海那时候是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它的股票市值仅次于纽约。现在能不能退回去？退不回去，那就按照市场已经做的选择，加大这方面的支持。所以我觉得，我们上海应该更多地看到自贸区对于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意义。我讲得极端一点，这恐怕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不抓住，国际金融中心就很难成功。所以我们应该大力呼吁，国际金融中心在任何国家只能有一个，现在中央已经定是上海，各方面就要下决心这样做。我说这个话，当然是从自己作为上海市民的角度来讲的，但同时也是作为中国公民的角度来讲的，上海真正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对我们国家走出去的金融战略是有好处的。不支持上海，力量分散，对国家的整体利益是很糟糕的。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王荣华：下面是提问和互动时间，各位有什么问题请直言相问。

提问与讨论

王世豪：谢谢乔依德的精采演讲，对刚刚出台的央行 30 条，他研究得很深。当然，央行 30 条还有待操作细则的推出。我非常同意乔依德的观点。提到上海的地位，我想问一句，30 条中的第 27 条，“上海市人民政府可通过建立试验区综合信息监管平台，对区内非金融机构进行监督管理。

可按年度对区内非金融机构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对区内非金融机构实施分类管理。”我觉得，把上海市人民政府推上了蛮高的层面，好像是授予上海市人民政府，至少在上海，由它来协调一行三会，有这个意思。这你没有谈到，你对这一条怎么看？

乔依德：是有这一条，但是我觉得这个表达不是特别清晰，我也没有觉得上海会有那么高的地位或者是能力来协调一行三会，这是我自己的感觉。为什么呢？本来我们期望自贸区上面能有一个领导小组，比如副总理挂帅，上海有一个推进小组，但是最后没有。这我觉得会有问题。我觉得这一条没有那么明确，它可能有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很难。

王世豪：4 月 11 号，韩正和杨雄向汪洋汇报的时候，汪洋副总理加了中国（上海）。在 8 月 17 号批上海自贸区的时候，克强总理加了实验两个字。现在听到自贸区的领导讲，他们是在实验的第一线，实验确实蛮难的。我非常同意你刚才讲的，干脆没有实验，还可以完全搞一套，就是自贸区。现在要实验，将来要全部推广，那么它的特殊性在哪里？你刚才讲了很多上海不可复制的东西，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确实很多东西不可能复制的。那么现在硬要复制，他们感到一线非常难做。8 月 27 号，正式听取自贸区汇报的时候，习近平亲自点将直接交给上海来牵头做。大家都知道，一行三会要有一个联合监管，大家呼声都很高的，不光是金融，其他的也要联合监管，不然怎么协同呢？我的理解是，这一条好像是授予上海人民政府协调权了，而且要进行评估。

乔依德：你讲得很对，根据我个人听到的，上海受到比较大的压力，希望能够比较快地拿出可复制可推广的东西。

现在比较容易做的，可能有几条，一个是政府职能改变，总归一个口子来审批很多东西，这个很快就可以做到。另外一个是负面清单，现在对此很多意见，认为负面清单太长，上海也表态了，应该很快把这个事情做好，这个相对而言比较容易。金融相对而言就比较难，张新也讲了，希望三个月能够落实相当一部分，六个月大部分落实，一年能够大致上看出来。我觉得上海只能做协调，而且我觉得很难做，上海不能命令别人。当然有问题的时候，最后恐怕还是要跟中央沟通，因为在我们的体制还是要领导拍板，没有最高领导拍板，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这是我的想法。

谢荣兴：我现在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为什么？原来一直讲，市场在上海，政策在北京，现在北京要成立证券交易所，就是所谓的新三版，中小企业场外转让系统，现在简称北京证券交易所。深圳和上海也在抢中小企业的资源，如果这个新三版的名字也叫证券交易所，对上海威胁就更大了。

乔依德：我也看了这个消息，我也同意你这个观点，我也在想到底有多大影响？官方的说法是，它的资金来源不同的，新三版是机构，因为风险比较大，。所以这个话怎么说呢，现在是比较分散。

谢荣兴：他是微小企业，怎么适合基金呢？怎么适合机构呢？不可能的事情。单个是很小，但是总量很大，量一大，当然是个人去做了，肯定是个人资金。

乔依德：我也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当然，作为我个人来说，当然认为应该是相对集中。但是中国的事情，各个地方都要发展，都要有自己的一套，要做很多东西。现在的自贸区算是给了上海一个机会。

谢荣兴：北京这个新三版酝酿很久了。至少在五年前，就跟我们开会讲过，新三版在北京交易，把新三版全部拿下去。北京酝酿已久，是有后台的，出面是证监会，姚刚亲自挂帅，大概五年前他已经讲了，已经决定了。所以我觉得很难动它。

徐明棋：乔秘书长，你的大部分观点我都是同意的。但是现在一方面强调金融中心，它应该是一个市场的产物，应该综合中央的权威，把上海的金融中心建立起来。其实从我们现在的整个金融体制，中国整个金融体系的特征来看的话，仍然是行政主导的，资源配置受行政干预的这么一个市场。十八大现在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按照这样的要求来看，我们现在的金融体制还是不适应的。如果真的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那么金融改革的步伐一定会进一步向前迈进。上海金融中心重要地位的发挥，一定要随着整个金融体系的改革往前推，地位才能逐渐显现出来。按照计划经济行政主导的资源配置，毫无疑问，北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比如说，他要把主要市场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因为是行政主导。但是未来如果真正让市场选择，必然会选择交易成本最低、市场化程度最高、最公开透明、市场秩序最完善、法律体系最完备、与国际最接轨的地方，才能逐渐发挥市场配制资源的作用。所以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包括这次在自贸区里面搞实验，从整个金融体制发展的大方向来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应该说还是有希望的。因为毕竟市场化程度提高了以后，北京和上海从市场化的角度来看，从交易成本、两个地方对企业有吸引力来看，上海自然更具有优势，30 年代上海就形成金融中心。但是现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面临新的挑战，就是互联网的挑战，它不需要

大规模的金融机构积聚在某个地方。上海按照传统的方式，把基础设施搞好，把金融机构集中在上海进行交易，建中心还是政府来推广，肯定会遇到互联网很大的挑战。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之上的那些金融机构，现在没有一家总部在上海，他们甚至不需要到上海来。但是未来有什么样的方法把这些机构吸引到上海来？自贸区的金融改革没有提到这一点。我在想，自贸区的金融改革仅仅是一个突破口，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指望靠自贸区的一些对外开放措施来迅速发展，短期来看很难。因为现在建立了一个防火墙，不让区内和区外境内之间自由交流。因此未来的连通有待于中国整个金融体制的改革。我持这样的观点。

乔依德：我呼应一下你的说法。我前面也讲过了，没有问题，如果按照市场起决定性作用，1949 年前已经选择过了。现在我提出来希望中央有更多的政策，这是基于目前的客观现状来说的。我们中国就是这样一个现状，除非你能改变这个现状，除非你能够完全倒退过去。但现在不能倒退过去，已经选择过，路径在那里面，当然就按照市场已经选择过的路径，政府作出必要的决策。为什么邓小平说这个话？因为过去上海是金融中心，已经做过了，以后要走出去，主要还是靠上海，他这个话还是很清楚的。既然这样讲了，就是这么按着做，这是一个层次的意见。第二个层次，现在的金融跟 1960-1970 年以前的金融有很大的不一样，哪怕西方国家也有更多的行政管制。金融危机后，美国的沃尔克法则的设置，政府有很大的监管权，原因就在于金融方面的流动性是没有规则、冲击力是很大的。所以政府也要发挥一点作用。而且让市场发挥作用并不等于政府不要做什么事。迪拜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当然有它客观的一些金融条件，那

边有很多石油，有很多资金，但它之所以能够起来，政府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与 1960-1970 年以前确实不一样。看看历史，纽约之所以成为中心，很大程度上有一定偶然，不是非常必然的。现在完全靠自发的力量，是比较难的，除非你倒回去。倒不回去，市场选择过的路径，就要下定决心按照这个做，我是这样理解的。

陆德明：乔会长的报告，探讨的问题是很前沿，因为现在全国上下都关心上海自贸区。我想提这么一个问题，自贸区的金融开放和将来中国若干年以后，假如说整体加入了 TPP 的话，这两个系统如何对接？我这几年外地走的比较多，上海以外的人看上海自贸区和上海人不一样，他们只关心这个自贸区建立以后，对我有什么影响，我的企业以后有什么机会。而且你的视角选择的是金融开放，自贸区对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推动。我想北京的看法也不一样。北京搞 30 条，可能并不是把推动上海金融中心作为首要目标的。他考虑的是，WTO 加入 12 年了，现在 WTO 被美国扔在一边了，美国玩另外一套 TPP，将来美国两大洋一掌控，中国又在外面了。我的理解是，可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作为金融开放，类似于 30 年前小平在深圳搞一个中国大陆和香港接轨，加一个台阶一样，这个自贸区可能为了将来中国几年以后加入新的体系做铺垫。从金融这一块来说，你觉得金融开放、金融开放 30 条，和 TPP 对接状况如何，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

乔依德：我觉得你的问题很好很大，当然，这个外面也谈的很多。我今天选的角度是比较窄的，是从金融 30 条到国际金融中心。你这个问题确实如此。从大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要搞上海自贸区？第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需要有

一个平台来做实验，这个我就不讲了。第二，你刚才讲了，从全球战略来说，现在越来越走向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

另外，现在全球博弈应该说比较激烈，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中国加入 WTO，中国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可能有一部分发达国家的人士，觉得心里不是很爽，希望能够建立更高标准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这里也不忌讳，我们国内有少部分人，对自己也有一些过高的看法，特别是 2009 年、2010 年、2011 年，有很多讲话都是非常过分的自豪，这当然也引起别人的反感。金融时报上有一篇文章说，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帮助的，你很了不起，但我也可以把你的毁掉，所以这个是互动的。我们中央对 TPP 的态度也是有变化的，两年以前报纸上都说这是阴谋。我记得当时叫郑永年来做演讲，他就讲了，包括我们内部都有讨论，觉得中国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来看这个问题。现在中央态度有变化，冷静看待。当然，TPP 一定能搞成吗？这个还要看。

自贸区这样搞，当然是为了便于对接。但我并不觉得金融方面一定对 TPP 有直接的影响，因为 TPP 并不涉及到金融很多，它涉及到知识产权、劳工的权力、国有企业的作用等，这都是我们很敏感的地方，包括负面清单。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个，我个人觉得是一步活棋，进可以和美国谈 TPP，谈双边投资协议；退也可以，如果它条件太高，我们做不到，也可以暂时不加入。但是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觉得总体上是这样的。

金融方面我个人觉得是很微妙的，也可以说我们是两难。如果人民币要走出去，资本项目必须要开放。如果开放了，准备得不好，国内利率市场化改革都没有做好，开放后短期资金进来，这个冲击能否受得了？我觉得这确实难度很

高的一个动作。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要做。从战略上面，哪怕 10 年 20 年，还是要慢慢往前挪，不挪，永远受制于人。但做起来，步骤还是要比较详细。我觉得从全球金融治理角度来说，金融方面是应该做的。

有些国内的事情不好说，因为只有邓小平有这个眼光，有这个魄力。邓小平说，要一抓到底，要见效。朱镕基讲话中也提到，他有一次送邓小平，在车上讲到开放，小平同志说，我支持浦东开放的，改革开放，你们搞晚了，但是还来的及，上海人脑子灵光，肯定比广东搞的快。大概第 400 多页上讲了这个话。他说，你要找江泽民同志多吹风。朱镕基说，江泽民同志是我们上海出去的，有时候不太好讲。小平就说了，行，这个事情我来讲。后来他回到北京，领导人见面，小平同志讲，因为江泽民同志是上海出来的，他有些话不方便讲，我以前说过了，我不管事了，但是这个事情我要管，你们要支持上海开放。第二天，国务院副秘书长就打电话到上海来了。当然，我们也很希望有这样的强有力的领导，能看准方向。这跟市场发挥作用是不矛盾的，因为现实就是这样的情况，没有政府这样的平台，市场没有办法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我希望领导有这样的决策，集中力量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但是现在很难，每个地方都要上，很容易大家摆摆平，各个地方分一点，这是很容易做的一件事，但是归根到底，这对整个国家是不是有好处？这很难讲，我是上海人，讲这个话，人家也不一定要听。但是作为我自己来说，我觉得这是对的，说不定哪一天最高领导能接受这个想法，更多地支持上海，这和上海发挥更大的市场作用不矛盾。而且上海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上海的法制、诚信体制虽然在中国是好的，但和国外相比差距也很大。北

京现在小学三年级不要学英语了，行，我们上海坚持，就要学英语，国际金融中心，不学英语行吗？这个事情还是可以做嘛。至于高考不考外语，这个当然是教育部决定的，你没有办法。但是我觉得，有的事情你还是可以做的。

王荣华：谢谢乔依德同志的演讲，谢谢提问的同志，他们问得很专业。特别谢谢今天一直参与到底的同志，谢谢各位。

中国改革发展新阶段与公共治理变革

汪玉凯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上海新锦江大酒店　2014 年 1 月 16 日

乔依德：最近可能有两个问题大家比较关注。一个是十八大以后，中央加大了打击腐败的力度，揪出了不少老虎和苍蝇。大家在议论这个的过程当中，也会提一个问题：怎么在制度上预防或减少贪污腐败的发生，这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大家最近议论很多，就是中央出台了很多新的规定，如八项规定等等，对公务员可能有一些压力。有些公务员好象觉得受了委屈，要离开公务员队伍，也有人批评说这个是撒娇。不管怎么说，在我们改革的过程当中，如何正确对待公务员，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政府是由公务员构成的，要使他们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也要跟整个社会的期望保持一个和谐，这个很重要。我们很高兴在这样一个当口，请到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先生。汪教授在报纸上经常有一些文章或者接受记者的采访，他长期以来在公共管理和行政改革方面有很多研究，而且积极参与我们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今天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改革发展新阶段与公共治理变革”，现在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汪教授给我们演讲。

汪玉凯：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能到上海和这么多重要领导，还有很多社科界的专家、朋友一起来做交流。上海是

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也是人才高度集中的城市，我想北京上海很多方面都有共性。这次三中全会开了以后，大家看到，海内外的反响是非常强的。我看到有报道，说中共如果能把这 60 项改革实施的话，中国可能发生巨变，他们是这样来形容的。还说这个决定远远超过了国际社会的预期。大家看最近紧锣密鼓出台的组织架构，前天公布了深改小组，他们说中国有史以来，没有这么顶级的深改小组，外界甚至说这会不会变成第二个中央，有这种猜测。凤凰网刚才让我谈谈国家安全委员会，我说我不能谈，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搞安全的。习近平是主席，原来没有想到李克强还会进到这里，他和张德江是副主席。后面还会有小组公布，还要公布一个网络安全与信息化的领导小组，这个小组和我们有点关系。原来这个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一直是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或者温家宝。后来我们给中央提过建议，十八大后我们的报告上去以后，习近平有两次批示。我们建议，由总书记当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的组长，总理当副组长，在中央层面设立信息化办公室。这次中央接受了这个建议。当然我是课题负责人，我的课题完成以后，报给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我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以委员会的名义报上去，引起高层的关注。这个小组主要文件已经发了，但是没有向外宣布，叫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不是有一个国信办吗？把那个机构改造成新的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信部将由信息安全协调司和信息化推进司，几个司都过到这里面去，这个小组还没有宣布。

现在正在紧锣密鼓地为全面改革提供组织架构。所以我想今天晚上，围绕“中国改革发展新阶段与公共治理变革”这样一个话题，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内，谈三点，和大家做

一下交流。第一，就是改革发展新阶段对公共治理的挑战；第二，公共治理变革重要性凸显；第三，排除改革的阻力，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我完全根据学者的视角来谈我的一些看法，因为是小范围的沙龙，所以我可以稍许放开一点。我上个礼拜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做报告，彭丽媛是院长，所以他们说，你这里讲的时候，口径稍微放紧一点，因为她直接是通天的，万一说的不好，别找麻烦。刚好讲的那天，彭丽媛被临时叫到总政治部开会去了，但是她说全部录像，等她回来再看。彭丽媛现在是少将，原来是总政歌舞部团团长，管的是梦鸽；现在调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当院长，管的是李双江。十八大以前，她调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当院长，是少将，所以大家看，中国第一夫人不是花瓶，那是高级领导人，九级的将领。

我首先讲改革发展新阶段对中国公共治理的挑战。如果大家注意的话，在这次决定里有个判断，是对目前中国形势的判断，基本就两句话：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觉得我们 60 项改革，几乎都是建立在对这一新阶段的判断基础之上。在我看来，可以概括为改革发展新阶段。为什么叫新阶段？我觉得新阶段有三个标志：第一，就是改革开放的整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第二，传统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第三，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有增无减。这三个是我们改革发展新阶段的三个重要标志。

首先，从改革开放整体格局发生的变化来看。我觉得现在改革开放整体格局，也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第一，中国改革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是人们对改革的认知度在大大下降。换句话说，现在中国老百姓，再也不象 30 年前那样支持改革，拥护改革。现在很多人反对改革，这种反对改革的

声音，既包括社会公众，也包括社会精英，上层对改革的阻力也在加大。否则你不能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薄熙来现象，在我看来，薄熙来绝不简单的是一个贪腐问题，他几乎离开中央另搞了一套。在薄熙来看来，邓小平这套不行了，他要另辟蹊径，另起炉灶，试图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所以在目前环境下，重构改革的共识，比当年发动改革都难，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中国“双转”在快速推进，社会转型推进，体制转型推进，但是积聚了很多社会矛盾和冲突。我举个例子，在上世纪 90 年代，全国每年发生的群体事件，平均 1 万起左右，这两年每年都在 15 万起左右，翻十几倍，这说明中国社会内在矛盾冲突激化了。为了维持稳定，我们大量增加公共安全支出。2012 年我们公共安全支出 7200 多亿，比军费开支多 500 多亿，这 7000 多亿公共安全支出，多数都用来维稳了。为了维稳，我们大量增加公安干警，现在全国公安干警超过 200 万人。我前面给香港的高官讲课，我顺便调研一下，你们香港警察和公务员是什么比例？他们说 20 比 1，20 个公务人员中有一个是警察。我们内地现在是 708 万公务人员，包含 200 万警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到四个公务人员中有一个是公安人员，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成本很高。为了维稳，我们不断出警。维稳在我看来是一篇大文章，不是靠出动公安干警能够解决所以问题的。第三，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越来越多，但是中国的形象不断的被西方国家所误解误读。误解误读后面既有深刻的政治原因，更有复杂的经济利益，不排除少数国家想在中国策动颜色革命。但是我认为在目前这个环境下，更多的是大国之间的经济利益博弈。我们能不能保住过去 35 年的改革开放成果，发现新的机遇，对新的

领导人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美国重返亚洲以后，中国国际环境急转直下，我们能不能有新的思维，新的战略，直接关乎中国未来。这是第一句话，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改革开放整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第二个标志，就是传统的发展方式已经走到尽头了。直接表现为，一方面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同时我们付出高昂的代价。经济快速发展，我想我不要讲，大家都很清楚，我说两个数。1978 年改革开放起步那年，中国人均 GDP 还不到非洲最穷国家的三分之一，2012 年我们达到 6188 美元，中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这是第一个数。第二个数，从 1978 年到 2012 年，这 34 年中，中国经济平均增长 9.8%，连续高增长 34 年。有人说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奇迹。在充分肯定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得看到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前年，我给中央党校讲了四个省部长班，他们请我讲的题目是“转方式、调结构与行政改革”。我当时提出一个叫“四个难以为继”的观点。这四个难以为继就是：第一，低成本出口战略，以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难以为继；第二，低端产业主导经济结构难以为继；第三，资源和环境的传统使用方式难以为继；第四，社会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问题使社会稳定的大局难以为继。这四个难以为继我不展开讲。我只举个例子，比如说低端产业主导经济结构。大家知道，过去我们 34 年，达到 9.8% 的高增长，但是在我看来它是三高换一高，资金高投入，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换来 34 年 9.8% 的高增长。后面还得加一句话，低效率。我们大量消耗，透支资源，破坏环境，这是我们增长的前提条件。世界上流行三句话，叫三流企业卖产品，二流企业卖专利，一流企业卖标准，最高端企业是卖标准的

企业。而我们大多数是不入流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自己的技术，就赚人家组装的钱，这样永远成不了强国。这么大的国家，只在世界产业链的下端，在高端没有多少话语权，这是成不了强国的。我记得，我担任浦东新区的顾问，那天发聘书的时候，包括阿里巴巴的马云、北京大学的周其仁教授，每人上去讲 20 多分钟，我也讲 20 多分钟。我讲上海浦东、北京中关村在高端产业方面，要能够代表国家说话。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乔布斯发明了 IPHONE 和 IPAD，这两个产品一出来，就变成世界的标杆了。诺基亚在 2012 年还是世界第一大手机供应商，市值 3 千亿美元，到 2013 年被微软用 70 亿美元收购了。为什么？创新不足。所以大家想想，为什么中央下决心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新兴战略产业，发展绿色低炭经济，我想核心就是要在世界产品高端有话语权。我可以举个例子，我第一次在张德江副总理办公室汇报工作，张德江副总理是受温总理委托听取信息化专家的汇报。在汇报中有个老先生，当年是江泽民的信息化顾问，80 岁的老人，在张德江办公室汇报，说到激动的时候，最后老泪纵横，哭起来了，很尴尬。他说他一生搞 60 年电子，有三大遗憾：第一，中国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形成自主可控的计算机技术体系；第二，中国没有形成自主可控的软件技术体系；第三，也没有形成自主可控的微电子技术体系。他说这三大技术体系，中国人完全亦步亦趋学美国，跟在美国人屁股后面学。俄罗斯计算机水平比我们低了一截，但是俄罗斯不受美国人控制，他是自主可控的。2010 年，中国计算机获得世界第一名以后，很多人很高兴，当时也震撼了美国，我们叫天河一号 A，比第二名美国计算机每秒钟运算快了 8 百万亿次。当时震撼了美国朝野，美国国会马上

召开听证会，让白宫介绍情况，白宫介绍完情况以后，议员们松了一口气，说原来不要紧，核心技术始终是美国的。这个硬盘都是蓝剑生产的，操作系数都是美国微软公司生产的，CPU 也是美国公司生产的，核心技术都在人家手里。但是上个礼拜，中国网络出现大面积瘫痪，全世界一共有 13 个根服务器，有一个总的根服务器放在美国，还有 9 个服务器，都放在美国，外面就三个，荷兰一个，日本一个，英国一个。中国一个都没有。核心技术都受制于人家。所以当时老先生跟张德江说，他建议中央应该象当年毛泽东周恩来时代打中国原子弹的翻身仗那样，组织国家梯队打中国新技术翻身仗。如果说那次会议上，老先生发言震撼张德江个人一个人的话，去年美国棱镜门斯诺登事件，应该说震撼了整个中国高层。这次中央为什么设立一个国家级的安全委员会，主要是应对非常规的安全。所以我们给中央的建议，为什么能被习近平批两次，就是设立以他为组长、李克强为副组长的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也是为这个来的。所以我说，如果我们在高端没有自己的话语权，那么你很难成为强国，这是我讲的第二句话，传统发展方式走到尽头。

第三个标志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有增无减。在十八大三中全会筹备期间，当时中央委托新华社搞了一个高层调研小组，这个调研小组在中央和地方有很多调研，对一些重点专家一个一个去访问。我还有幸被叫到新华社总部去谈了一下午，你可以放开谈，不要受任何限制，你认为三中全会应该如何改，改哪些，你可以放开谈。他们通过动态取样，把副本送给最高层。我当时也谈，我说十八大以后，习李上任，得到很多好评，但是习李上任，不足以化解中国的风险，中国目前仍然面临很大的风险和危机。我在一个学者的

角度来看，目前至少有四种险，第一经济风险，第二社会风险，第三信任风险，第四政治风险。所谓经济风险来讲，大家看到，现在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尽管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已经证实主要高层的判断，就是中国经济还没有出大问题，我们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有意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这个判断从这些公布的数据也可以得到证实。但是经济的隐忧非常明显，在我看来，我们经济发展中最大的有三个风险：第一，房地产泡沫；第二，地方债务，原来公布 12 万亿，这次家底摸清了，地方政府一共欠 20 万亿；第三，影子银行，一方面流动性泛滥，另一方面银行圈钱。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有一个出问题，都可能引起连锁反应。所以尽管高层说，经济没有出大问题，但是他们对经济高度紧张，他们的心理底线是中国经济不能降到 7% 以下。胡温执政十年，尽管有很多问题，但是他们手上有一张牌，经济一直高增长，拿经济增长这张牌反过来解决不少社会问题。如果一旦经济增长速度降到 7% 以下，就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失业，社会振荡，这方面一点不敢小视。第二个，社会风险。社会风险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利益格局整体被扭曲了。造成利益格局被扭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在我看来，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分配制度不合理。35 年下来，我们四大差距没有一个被缩小，都被放大了，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一端，是中国 1.2 亿人没有解决贫困问题；另一端，中国富人在全世界兴风作浪。这说明分配制度出问题了。第二，机会不均等，企业和人的发展不处在同一竞争起跑线上。国有企业过于强势，国有企业基本解决不了腐败，民营企业相对弱势。人和人的发展不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有权有势的小孩发展空间很大。农民的小孩、草根

的小孩，即使考到清华北大一流大学，毕业以后也未必找到体面的工作。有人说中国进入全面的拼爹时代，拼老子。这种现象出现，就是阶层相对被固化了，底层人往上的流动空间越来越少了，这就可能引发革命，甚至危机。你们想，王岐山为什么让官员看一本书《旧制度大革命》，他学历史的，绝不是无病呻吟。去年 7 月份，云南省委书记请胡德平，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到云南想座谈一下，也读这本书，你如何看这本书？胡德平在探讨中举起一面改革的旗帜。我这两天参加他很多活动，当时他到云南的时候也带着我去的，跟云南省长领导人有过一系列的交流。他后来把他这篇长篇文章，发表在去年的经济观察报上，12000 字的长篇文章。当时正在批宪政，我们每天晚上四个人都在胡德平的房子里，说这个形势怎么往下发展，批宪政你认为怎么往下走？他也非常担忧。他当时跟云南省领导交流的时候，第四部分的标题讲的就是“有宪法必有宪政，无宪政宪法也不神圣”。在中国批宪政最高潮的时候，胡德平和云南省领导交流的时候，不仅讲这样的观点，而且文章全文公开发表了。所以我说，王岐山让大家看这本书，就是改革不能慢，改革慢了以后，可能爆发危机，甚至爆发革命。第三个就是既得利益兴风作浪，既得利益在整个利益格局被扭曲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三者叠加，分配不合理，机会不均等，既得利益兴风作浪，扭曲整个社会的格局，这是中国社会现在不稳定的根源。这是第二个风险，社会风险。

第三个就是信任风险。我们给老百姓的承诺能不能兑现，医疗、教育、社保、社会服务，如果这些承诺不能兑现，不能让老百姓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老百姓很难再次起来对党和政府信任。你看习近平上台不久，他做的第一个判

断是，腐败亡党亡国。但后来他又做了一个判断，他说人心向背决定执政党的生死存亡。我认为习近平后来的判断，更加接近问题的本质。这是叫信任风险。

第四，政治风险。我们能不能构建起制度笼子，防止整个制度腐败的蔓延，不仅关系到腐败本身，而且关系到我们能不能重构改革的共识，让老百姓第二次起来支持我们的改革。应该说，新一届领导上任给解决这些问题和风险提供了重要的时间窗口，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是他们成功上任，不足以化解这些风险，所以才需要以更大的勇气，更大的毅力，全面改革，通过全面改革来化解这些问题。这是我的第一个分析，改革发展新阶段对公共治理的挑战。

第二，就是公共治理变革的重要性凸显。大家看，这次三中全会改革决定中，确定改革总目标，是相当多人都没有想到的。前面一句话是前提，“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核心在第二句话，“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觉得，这个大目标的确立，不仅仅意味着我们最高领导层接受了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而且应该说，跳出我们过去很多窠臼，把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我们改革的总目标。这里面讲了三个核心，就是要让创造财富的各种源泉能够涌动，让社会活力能够得到释放，让改革成果被全民共享。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下面的核心点，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那么，我们再分析一下，为什么我说目前公共治理的紧迫性凸显呢？如果回想的话，我认为中国改革内在逻辑正在发生变化。如果说过去 30 多年，我们以经济改革为主导，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干，展开各项改革的话，其它改革说到底是为经济改革服务的。但是我们看到，越到后来，

党政机构、政府越来越成为社会矛盾的中心，成为社会矛盾的聚焦点。所以尽管这次三中全会决定说，未来我们要以经济改革为牵引，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但是在我看来，经济改革目标的实现，主要障碍都不在于经济领域，而在于政府，在于执政党，这成为目前的关键。所以我说公共治理变革的重要性凸显，而政府、党政机构处在公共治理变革的核心地位。为什么他们的改革重要性上升呢？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其他各项改革能不能推进，在多大程度上推进，几乎都和政府执政党有关。你看我们前面提到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生态改革、执政党制度的改革，这六大改革每一项都和政府、执政党自身有关。所以我理解，为什么这次成立了六个专项小组？基本可以看成两块，政治改革三个，占了一半，民主法制领域改革、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这三个专项小组，都和政治改革有关。另外就是经济和生态小组，文化一组，社会一组。整个政治改革占了三个专项小组。所以我说，以经济改革为例，你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财税改革，投资体制改革，这些经济领域的改革，好改的早改过了，剩下难改的都和政府有关，如果没有政府改革的推进，这些改革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政府治理的能力直接影响国家治理的成效。我前面讲了，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包括很多内容，既包括组织体系，国家的法制体系，体制机制，也包括人的观念，管理观念，管理水平，是全方位的。在整个国家治理架构中，政府治理处在第一线，国家治理很多目标通过政府治理来实现。如果政府自身问题不解决，能力不高，直接影响整个国家治理水平。第三，从政府问题来讲，至少现在我们还有三个迫切问题。

尽管过去六次改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但是现在从上到下，我认为有三个迫切的问题。第一，整个治理结构不够科学，不管党政的问题也好，政府内部的组织架构也好，都还有很多关键性问题没有解决好。再一个，政府管理中的深层次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老百姓的认可。比如说，转变政府职能滞后的问题，政府自身改革滞后的问题，行政审批过多过滥变成腐败温床的问题，还有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薄弱的问题。在这些关键问题上，老百姓不满意。第三，是我们政府形象。政府的行为一直得不到有效控制，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劳民伤财，严重影响政府的形象。所以从这个上讲，公共治理变革的紧迫性可想而知。

未来中国公共治理变革路径和核心议题是什么呢？这个我想简单讲一下。我觉得可以通过这几个路径。第一是要优化公共治理的体系和结构；第二是突出政府改革，如转变职能，创新政府管理方式；第三是提高公共治理能力，包括公务员队伍素质；第四是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步伐。通过这些路径，通过这些公共治理变革，我认为未来在这一轮改革中，从公共治理这个视角来讲，有可能解决五个核心议题。第一，重构政府和市场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逐步使政府治理现代化。大家看到，这次把两个字改了。我前面和吴敬链先生在一个论坛上发言，他在我前面讲，他说他这次理解三中全会决定，最大的理论突破就两个字，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改成决定作用了。你现在可以倒过来看，凡是影响市场决定的政府管理体制机制，都应该是改革的对象。政府只有在市场决定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我觉得，吴敬链先生的判断是有道理的。要发挥市场决定作用，我觉得主要解决

两个问题：一个，政府要向市场放权；一个，要开放市场。从开放市场来看，这次改革决定里面，一大堆问题都是围绕这个展开的，包括建立统一市场体系、打破行政壁垒、开放金融、开放服务业、反对垄断、改革国有企业、构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政府向市场放权，一共有五大举措，实现政府向市场放权，比如说减少投资审批、减少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审批、减少不必要检验检测许可认证，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改革企业注册登记制度。前不久在成都，国家工商总局和四川省政府联合搞了一个工商管理高峰论坛，我和厉以宁先生被邀请做演讲。当时张茅局长说，他们这次改革就两句话，核心是两句话。第一句，先照后证。过去是先证后章，你把章盖完，所有证件办完以后发营业执照；现在颠倒过来了，叫先照后证，你今天注册，马上给你发营业执照，你可以营业了，手续补办都可以。第二句，没有注册资本的要求了。过去注册，普通的企业有注册资本金限制，现在没有了。这两个区别，鼓励人创业，降低市场门槛。宽进严管，先让人进来，进来再按照企业管理法管，不是一开始就把人挡在门外。这是第一个核心议题，就是重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政府只有在市场决定论基础上，再发挥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等。

第二个核心议题，是要全力保障民生，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我觉得过去这些年，中国改革受到老百姓最大的置疑，就是公平正义。比如说，我们的政策制订越来越有利于富人；弱势群体、下岗的、打工的在政策制订的时候，声音越来越小。大家看到，这次 60 项改革，有 18 项都和民生有关，全力保障民生，体现社会公平公正。具体来讲，要加大对民生投入，要加大与民生有关的体制机制改革的力

度。这次提出体制机制改革，与民生相关的改革，目标都非常具体。比如说，取消事业单位，医院、学校、科研机构的行政级别，这句话涉及到 120 万家事业单位，3 千多万在职人员，还有 800 多万离退休人员。这句话改起来有多么困难！在比如说，医院改革，不能以药养医，医药要分家；要保证教育公平公正，改革基础教育，减少考试科目；养老方面，公务员养老，企业养老，事业单位养老，三支要并轨，延迟退休年龄等等。所有这些改革几乎都和民生的体制机制有关。还有比如说，对农村，农民是最大的弱势群体，要建成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让农民有更多的财产性权利，各种要素能够自由流动。我认为，这次改革很大的一个着眼点，就是要让公平正义照耀在农民这个最大的弱势群体身上。过去这些年，我们最大的教训之一，就是双重剥夺农民，不是有意的，是无意的，客观上，对农民造成双重剥夺。第一，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农村共有 2.6 亿农民离土了。他们进城里后，没有和城市人处在同等就业起跑线上。他们干的全是最脏最累的活，拿到的报酬相当于城市人的一半，年龄大了，干不动了，到乡下养老，城市和他没有关系。数以亿计的农民被剥夺青春年华，这是第一重剥夺。第二，我们城镇化变成圈地化。我们城镇化根本变成一个城市空间的扩张过程。我说个数，从 2000 年到 2010 年这 10 年中，中国城镇人口增长 26%，但是中国城镇面积扩张了 50%。为什么？这是土地制度决定的。我们土地制度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在征地过程中，给农民一些补偿。除了公共用地，剩下的政府高价卖给开发商，地方政府独享了巨额的土地增值收益，把农民这个本来土地的所有者，排除在参与土地收益分配的门槛之外。

所以大家看到，征地越来越变成战争。据我所知，这次围绕土地制度改革，是最大的争议焦点之一。第一个，要不要废除劳教制度，第二个，要不要农民集体土地可以流动？这是争议最大的，都写进去了。有人说，中国将进行第二次土地改革，第二次土改的直接受益者是农民。这是第二个核心议题。

第三个核心议题是，创新社会治理，释放社会活力。去年年初，孟建柱讲的四句话引起广泛关注：废除劳教制度，改革信访制度，改革司法审判制度，改革户籍制度。现在证实，全部被写到这个改革的决定中了。我觉得过去这些年，我们在社会管理方面有过一些创造，但是我认为整体上，在很多方面走偏了方向，就是说，把社会管理变成了对人的行为管控。大家看到，这次完全是掉过来了，就是社会治理主要释放社会活力。这次把国家管理变成国家治理，政府管理变成政府治理，社会管理变成社会治理，治和管这个字的改变，意义重大。所以大家看到，这次包括废除劳教制度、改革司法审判制度、省级以下司法实行垂直管理，将来可以建地区性的法院，主要是解决地方权力对司法审判的干预，要保证司法公平公正，为我们下一步司法审判相对独立奠定基础。再一个，要对社会放权，四大类社会组织都放开了，取消双边管理，整个占 80%。行业协会和商会，科技的社会组织，公益的社会组织，社区服务的社会组织，基本都放开了。就是说，社会治理最终是要释放社会活力，不是把每个人管起来，把行为控制起来。

第四个核心议题，就是用法律构建制度笼子，用制度管人管权管事。我在很多地方演讲，我说中国这种体制有很多优势，比如说，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说，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但是中国最大的软肋，就是到现在没有找到一个四两拨千斤的管理约束公权力的制度设计。监管公权的主体还少吗？我掐指头算有六个主体，纪委一条线，监察一条线，审计一条线，预防腐败一条线，反贪一条线，巡视一条线。光主体就有六个，但是对一些单位的主要领导人，一个地方的主要领导人，几乎为零。我跟他们讲，咱们讲道理，你能不能给我找出来一个县纪委书记把县委书记给监督下去了？如果找不到，这个制度是失败的。还有，为什么这么多人边腐败边提拔？它当市委书记、县委书记的时候，问题都曝露不出来，只有当他提拔到上一级政协副主席，上一级人大副主任，离开这个地方了，他当书记时的问题都曝露出来了。不是说共产党愿意提拔腐败分子，是它没有办法发现。再一个，凡是在哪里当主要领导人，到这个市当市委书记，到那个省当党委书记，主要领导人是哪里人，他老家承包队大量在那个地方包揽工程。他家乡的工程队，能在他所任职的地方能揽到很多大的项目，这是什么原因？如果你不能对这些作出科学的，令人信服的解释，就说明这个监督体制有问题的。所以大家看到，这次专门设了一个纪律检查的专项小组，下决心想解决中国的软肋。比如说，它利用法律构建制度，用制度笼子来管人管权管事，让人民有监督的权利，公开透明，构建权力清单，保障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我说十八大提出的三清改革目标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 708 万党政公务人员个人的清正，政府清廉是空的，政府清廉是通过一个一个公务员的清廉、清正保证的，只有公务员个人清正了，政府清廉了，我们才有可能实现政治清明。再就是创新监督的体制机制，所以大家看到，除了我前面讲到的省以下司法相对独立之外、垂直管理之外，要改变

纪检监察体制，就是同一级党委再没有权力提名同级纪委书记、副书记了，由上级纪委提名，这个书记副书记是双重负责制，既要对同级党委负责，也要对上级纪委负责任。这就解决王岐山叫做灯下黑的问题，就是一个县的纪委书记监督不了县委书记，一个是市纪委书记监督不了市委书记，这是重大的调整。再就是巡视制度的广覆盖，全覆盖，不仅党政机构，还有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再就是对官员提出更严格的要求，比如说六不准，不准超标配办公室、不准超标配车等等。

还加了一个叫“探索实行官邸制”。大家可能注意到了，这是我去年主持的课题研究。我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的，我们会长是魏礼群，他是大笔杆子，也是重要的智囊人物。我们去年有若干课题，其中公车改革研究、官邸制研究是我主持的，主持完以后，我们去年 6 月份就出来三个报告：一个是国外官邸制研究，一个是中国古代官邸制研究，一个是党政领导干部住房现状分析研究。三个报告出来以后，我写了一个不到五千字的建议给中央，建议实行官邸制。我们魏礼群会长直接送给习近平和李克强，送给中央领导。后来我一看，这个完全被写到决定中去了，就七个字，探索实行官邸制。后来决定出来以后，我才把这个方案抛出去了，中央办公厅打电话把我的三个专题报告都要走了，不仅要看建议稿，还要看三个研究报告，要抓紧建立国家官邸制。我提的是我学者的建议，会不会按照我们的具体方案实施那不一定，但是方向已经定了。

你们注意到，我当时提的方案没有按照行政级别来，我和公车改革的方案就不一样。公车改革方案是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司长邓文奎以研究会的名义承担的，他就按照

行政级别来的，副部以上配专车，以下公务用车都取消了，引起一片骂声，地方政府阻力大了。市委书记说，我就靠这辆车工作，没有这辆车怎么工作都不知道了。实施起来可能会有问题，副部级以上的人配专车，其他就保留通讯用车、应急用车、执法用车，一般公务车都取消了，那市委书记、县委书记怎么工作？我当时考虑呢，我就考虑从实际出发，所以我当时在主要官员上就设九个人有官邸，七个常委有专门的官邸，再加上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有人说，政治局委员你都不给弄，给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搞官邸。我说这是代表国家法制的尊严，官邸必须要住的，代表国家的象征。其他国家领导人实行公宅制，你当副总理、当政治委员，给你按标准配一套房子，你可以也可以不住，不住给你补助。不管是官邸还是公宅，当这个领导人，住；不当，出来。

现在告诉大家，习近平、李克强两个在中南海都没有房子，都占满了，没有地方再给他们两个盖房子了。老人现在活的寿命很长，副部以上的领导干部平均寿命 90 岁。我们这儿还有副部领导，我们希望你们活得更长。我们现在全国人平均寿命有 74 岁，副部以上领导干部，没有 95 也有 90 岁，医疗条件好，身体也好了，活的寿命长，过去是谁住进去就不出来了。实际上没有这样的制度，国外都是有官邸。省里头设 6 个岗位，省委书记、省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一直到县上，县也是 6 个岗位。你当这个官，就住这个房子，不当就出来。国家盖，国家配设备，你不要花钱。美国人是花一美元，象征性缴一美元。我们不要交，免费的。

再一个，交流干部。一级二级干部叫流转法，铁打的房

子，流水的官，你到这个地方任职来了，给你住一个房子，不任职，走人。所以最近网上流传的，说七常委公布财产，财产统计出来了。房子最多的就是习近平，三套房子，当然真正价值说不清楚。第一套，福建，他在福建任职 17 年；第二套，杭州，当省委书记，上海没有；第三套，他老婆在总政治部歌舞团一套。房子最多就是习近平，三套。因为过去没有这个制度，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当领导人，配一套房子，走了以后，也没有交的机制，他可能就带走了，慢慢成为自己的了，这个不应归他个人。当然中央会不会按照我们的具体方案来实施呢？不一定，但是方向已经定了，就是探索实行官邸制。

第五个核心议题，就是加大党政自身改革力度，提高公信力，包括转变作风、降低三公消费、反对四风、公开透明等等。特别是八项决定出来以后，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后来中央也找几个专家进中南海座谈，我也有幸被点名，我说过去中央没有少发决定，也没有少发制度，为什么都不起作用？这次作用为什么这么明显？我说我感觉就一条，就是政治局 25 个委员带头做起。你们想习近平上任后，第一次远行就到深圳，住商务酒店，吃自助餐，他的车队不让封道，跟邓小平学不让铺红地毯，一改中共高层领导出行的方式，产生强烈的反响。

据我所知，这八项决定出台，除了学邓小平，他自己的感悟是很重要的。他在福建 17 年，1987 年在厦门选副市长被选掉了，到最落后的宁德去当地委书记，他有过人生低谷的时候。他后来到包括上海的三个重要地方任职，转了一圈，直接经历，对民间是非常了解的，这毫无疑问。但我知道也有人提过建言，我就有过亲身经历。十八大以后，胡德

平有过一次活动，他经常以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这个网站的名义搞一些活动。那天来了好多高干子弟，包括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就是最近老在网上给文革道歉的那个陈小鲁，包括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陆定一的儿子陆德，好多人，有些我叫不上名，我是被他们叫做专家学者。那天呢，在朝阳门外蓝岛大厦开的会，他们说，十八大方针已定，咱们现在主要给中央提具体建议。第一条建议就是：建议主要领导出门，一律不能封山，不封山，少封路，尽量少扰民。这些高干子弟，讲了很多例子，也批评很多领导人。其中就讲到北京市委书记刘淇，说刘淇 2012 年下来以后，到长白山转了一圈，结果当天把长白山全部封了，大概有将近 1 万人上不了山，骂声连天。他们说，连邓小平当年上黄山都没有封山。如果邓小平把黄山封了，邓小平能在黄山上面见到大学生吗，能在黄山上面和大学生聊天照相吗？连邓小平都不封山，现在政治局委员动不动出门就封山，封路是家常便饭。这个建议他们怎么弄上去，我一概不知，但是后来时间不是很长，中央就出来八项规定。所以我说，后面也有人建言。

当然，象习近平这样出门不封道，地方压力也很大。我举个例子，他请不久到山东转五天，在山东考察期间，我在山东国安厅大讲堂做过一次演讲，那个厅长中午请我吃饭，诉苦。他说把我们整苦了，习主席不让封路，这麻烦大了。他走好多地方，本来去四天，结果青岛爆炸以后他早来了一天，就变成五天了，青岛之后，他又跑到临沂，菏泽，曲阜，到处转。山东是胜利油田所在地，到处是拉油车，车辆那么多，万一出现问题怎么办？山东人负不起这个责任啊。不让封怎么办呢？他们弄了几千公安人员，都穿上便衣，开

着社会车辆，走在总书记的前后，都是公安人员开的车。还不敢跟总书记报告，他们当时说什么呢？他们只控制跟总书记同方向车的流量，跟他一个方向走的流量适度控制一下，地方车绝对不控制。就这样保证总书记安全。说是比过去麻烦大多了，过去一封道，简单，成本低，现在不封道，成本高多了，他们压力也很大。我的看法是，现在高层领导是严厉地治官，我在十年以前，我提过中国公共治理的 14 字方针，你们可以在网上看我们的文章，第一句严治官，第二句善待民，第三句创新政体，第四句稳定银根。这是我在十年以前提的中国公共治理 14 字方针。没有想到 10 年以后，这届政府意图很清晰，严厉地控制管理官员，螺丝将会越拧越紧。现在制度化了，出台了党政机关节约条例、八项规定、反四风、严格清车，清办公室，螺丝越拧越紧。现在确实象刚才秘书长所讲的，引起很大的反弹。很多地方公务员说，去他娘的老子不干了，我下海吧，趁我现在还年轻，还能挣点钱，这里不好干了。广东省一个月有四个厅级干部辞职了，下海了。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中国如果不治好 708 万党政干部队伍的话，共产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很难再次得到老百姓的信任。而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可能会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经过这样的严格控制以后，一些被淘出来的人可能是意志薄弱者。我估计将来在队伍建设方面会更加严格。

但是我的看法是，中国的核心问题在于用人，所有的问题都在于用人这个问题上。你看这次有一个党的建设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如果不解决用人这个问题，我认为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一把手用人，一把手说了算，我认为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我曾经在这方面写过一些建议，但是组织问题太大

了。我的建议就是，县一级，书记县长一个人来当。书记县长两个人当，绝对是错误的、不好的体制，绝对是闹矛盾的体制，很容易产生冲突。两条线一个人当，书记县长一个人当，人大主任不能让书记来兼。两条线选出一个一把手，还不改变党管干部的原则。你共产党可以推荐人，推荐四个到五个合格的书记候选人，让党员代表大会投票。你演讲，党员代表大会认为将来谁当书记合适，投票出来，一二三四排出来，前三名就竞争县长去。你到人代会去演讲，竞争县长，最后人代会认为谁最合适，谁当选县长，谁就既是县长又是党委书记。你党这边推荐过来的三四个人都合格，就看谁能选上县长，这样的话，就是让党员和人民群众决定一把手。这样他就不会只对上面负责，也要对下面负责。这第一个叫广泛任人唯贤。第二个叫任人唯唯信，你来组阁。我当一把手以后，我用哪一个部长，哪一个局长，我说了算，但是你要承担连带责任。现在我们给你配一个县长，给你配一个局长，是组织部派的，这个局长可能和县长是矛盾的，是顶着干的。你看国外也是，他有组阁权，他承担连带责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样既能体现共产党的执政领导地位，也能保证决策的效果和不腐败。人大主任是独立的一条线，纪检是一条线，两条线协助一把手。我现在要进一步完善我这个建议，中央能不能这样搞不一定，主要是在我们二千多个县、区采取这样的体制。

最后再讲一个观点，排除改革的阻力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智慧。这次改革方案得到广泛认可，这个顶层设计不易，制订好的方案不容易，把好的方案变成现实更难。在我看来，公共治理变革要上下联动。从政府这个视角来看，行政改革是整个政治体制的下端，它能解决的是政企分开、转变职

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而在我看来，政治体制还有上端，有四个更核心的要素，就是宪法的权威、政党的作用、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这四个是整个公共治理体系结构的上层部分，它更具有决定意义。所以我说要上下联动，不能只在行政层面做文章。

就我个人理解，在未来公共治理变革中，最大的阻力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既得利益，二是政府自身。我在三中全会前写过一篇文章，叫“冲破既得利益的藩篱是二次改革成败的关键”。我把过去这几十年的改革叫第一次改革，以这次三中全会为标志叫第二次改革。我对既得利益有一个理论的界定，我认为所谓既得利益，就是通过非公平竞争的手段和方式、借助公权力和政策资源、获取巨额利益的相关体。这里有三个关健词，一，它通过非公平竞争手段和方式，获取巨额利益；第二，它借助公权力和政策资源，获取巨额利益；第三，它获取巨额利益，主要指经济利益，但是也包括政治利益、社会利益。这是第一个，什么叫既得利益。

第二，中国既得利益的形态。我在 2011 年，在中央党校发表过一篇文章，系统分析中国目前既得利益的表现形式。我还提出三个灰色：灰色权力、灰色资本、灰色暴利。就是主要靠公权力的影响力，通过子女、配偶、亲戚朋友，在市场进行资本变故，一夜之间就变成亿万富翁，这是最大的腐败，真正大的腐败。现在中国既得利益至少有三个形态，第一，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既得利益；第二，以垄断行业为代表的垄断既得利益；第三，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和资源既得利益。这三大既得利益，既掌握权力，又掌握资源，还掌握资本，羽翼丰满，实力雄厚，控制

相当多的中国社会财富。

第三，我们再看既得利益的危害。在目前中国环境下，既得利益至少激化了三种冲突，一官民冲突，二劳资冲突，三贫富冲突。社会上弥漫着仇富仇官的心态，群体事件的后面、大量黑色资本变故的后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既得利益的影子。所以我认为，最大的就是和既得利益作战，危险还没有过去，你能不能战胜既得利益，还是既得利益最后吞噬你，现在还难以下定论。所以我说二次改革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有效地遏制、战胜既得利益。

我们再看，高层对既得利益的判断。十八大以后，习李不断对整个改革的趋势做判断，比如说，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要啃硬骨头，改革没有坦途，改革要涉险滩，改革准备付出成本。决定还说，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改革只有起点，没有终点。这些说法，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当前的环境下，改革难度大、阻力大、风险大。那么再看，高层对既得利益怎么判断？十八大后不久，李克强说，动利益比动灵魂都难。习近平多次讲，要有更大的勇气和决心，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习没有直接用既得利益四个字，但是在我看来，他说的利益固化，主要就是指既得利益。包括最近进一步对整个反腐败说很多狠话，刮骨疗毒，猛药治病，反腐败不设上限，清除害群之马，所有这些，我想他都是有所指的。这些判断就说明，既得利益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中国改革最大的阻力和风险，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阻力来自于政府自身。政府不是有意识的阻力，他自身的惯性就可能对这次的全面改革形成阻力。三个方面，一个是观念，一个是审批制度，一个部门利益。这三

个有可能构成政府对这一轮改革的阻力。审批和部门利益，我都不讲了，大家都很清楚。我们现在审批这个结构，几乎可以看做是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演变出来的怪胎。温家宝 2002 年上任的时候，国务院的主要部委有 4300 多项行政审批，他搞 6 次改革，精减掉 2490 多项。他交给李克强的时候，国务院还有 1700 多项。李克强说，他在未来五年要拿掉三分之一，去年不到一年，去年 3 月份新一届政府到现在，国务院已经拿到 334 项。他这届政府一共要拿掉 567 项，去年不到一年，就拿掉了 334 项。审批改革如果不到位，改革很难成功，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都是空的，而审批改革难度阻力是很大的。再一个是部门利益，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团体化。我重点讲观念的障碍。我觉得如果没有 708 万公务人员观念的变革，没有观念的更新，肯定成为改革的阻力。观念中核心的有三个：政府的角色观念、服务观念、法制观念。

我以法制观念为例，大家都很清楚，政府权力受到严格的法律限制，叫法律不授权，政府无职权。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力是相反的。公民权力在法律上规定的是你不能做什么，不能杀人，不能放火。但是法律规定对政府来讲是你只能做什么，没有规定的你都不能做。所以才有一句话叫依法行政，依法行政的另外一个解读就是政府的所有作为都要有法律依据，否则就是乱作为。

所以大家看到，习近平上任以后，非常重视法制，包括这次三中全会，也讲到法制中国，要树立宪法的权威。他所以强调法，有两个考量，第一，基于文革的教训。文革最大的就是无法无天，法制完全被破坏了。刘少奇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拿着本宪法，在他中南海的住所里面，几乎到了歇斯

底里的地步，他叫，说一部宪法保不住国家主席生命安危。刘少奇后来被紧急疏散到河南开封，死了以后放在开封地下室的过道里，白头发一尺多长，这是文革的悲哀。现在第二个考量，我认为与薄熙来有关，就是重庆打黑。我不是说打黑不好，但是打黑不能离开法制，离开法制，可能该打的不打，不该打的乱打。我当年在重庆唱红打黑最高峰的时候，2010 年 12 月 9 号，重庆市委请我做过一次大报告，40 多个会场。他们组织部长还见了我，我上台以前，他们跟我提出要求说，你是个有名的学者，我们今天有 41 个会场，你能不能帮我们重庆唱红打黑评价几句。但是我一上午的报告，我连重庆唱红打黑一个字都没有提。我当时有保留，有保留是两个原因。当时在国家行政学院我正给汪洋做课题，汪洋请魏礼群做了一个系统分析行政改革的课题，我是主要操刀者。汪洋和薄熙来两个隔空喊话，隔空较劲。第二个，我从价值层面上判断，我也不认可唱红打黑，因为他们把辩护律师李庄都抓起来判刑了。所以我一句都没有评价。

由此我想到当年美国总统小布什讲的一段话，他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可贵的不是令人眼花心乱的科学技术，也不是文人们写的那么多浩瀚的著作，而是人类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把统治者关在笼子里，让他不要害人。布什说，这个笼子就是国家的法律。布什继续说，他现在正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所以我说，如果没有正确的法制理念，我们官员都可能成为这次改革的阻力。所以，中国在这样的环境下，就要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来化解阻力，靠共识，靠思想解放，靠创新。如果当年没有邓小平发动真理标准讨论，文革难以否定；如果没有 92 年邓小平南访谈话，中国改革到不了今天。所以我说这个全面改革方案的实施，又到了这样

的关键时刻。我们越敢出手，越敢在关键领域推进改革，我们面临的危机风险越能够化解，越能够获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会越巩固。反过来，越畏首畏尾、瞻前顾后、不敢出手，不仅危机难以化解，老百姓信任难以获取，甚至会威胁到共产党执政本身。这大概就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改革发展的辩证逻辑。好，谢谢各位。

乔依德：非常感谢汪教授给我们做了一个很精彩的报告，我想了一下，可以用 16 个字来概括：论述全面，重点突出，条理清楚，立意新颖。他有些观点还是很新颖的。那么下面呢，我们抓紧时间，大家可以提一些问题。

提问与讨论

谢荣兴：关于反腐的问题。中纪委，我觉得就像家长管孩子，可以棍棒下面出来三个北大生，也可以象梦鸽一样出来李天一，所以它是家长。那怎么更加有透明度呢？上海市委统战部召开座谈会，我提了意见，我说中纪委能不能让民主党派也一起参加，看一看案子是怎么回事，增加透明度。为什么？因为我们认为，可能协调得好就没事了，协调得不好就抓起来，这就是家长。所以我觉得，您是行政学院的，能不能要求让民主党派参与中纪委的办案工作。

汪玉凯：我是一个学者，高层对我的定义是体制内学者，不是社会学者，所以我们经常递一些建议。我对这个问题，我再思考一下，我认为非常有意义，提的很好，谢谢。

乔依德：还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呢，我们今天的沙龙就到此结束了。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汪教授的精采演讲表示感谢。另外也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沙龙，这个沙

龙是农历新年以前最后一次了，也预祝大家新年快乐，明年再见。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